

# 《重建巩昌府学宫碑》所见晚清陇西儒家教育困境与官员实践

巩丹阳

兰州文理学院文学院

DOI:10.32629/er.v9i5.7032

**[摘要]** 晚清同治年间西北战乱，加之自然灾害不断，书院几近消亡，光绪五年巩昌知府颜士璋在目睹学宫毁于兵燹后，主持重建并撰《重建巩昌府学宫碑》。本文以此碑记为核心史料，提出战乱后陇西儒家教育困境，即学校荒废、儒学衰微、人心无所依归，对此，颜士璋身为儒士，积极请示上级，官绅合作，筹集经费，并在重修巩昌府学宫时融入表现儒学礼制，以期达到教化民众的效果，碑记生动呈现了一位儒家士大夫在战乱后面对学宫废墟时的忧虑和实践，也为晚清陇西儒家教育困境与官员实践提供了一个范式。

**[关键词]** 重建巩昌府学宫碑；儒家教育困境；颜士璋；实践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The Dilemma of Confucian Education and Official Practices in Longxi in the Late Qing Seen from the 'Stele of Rebuilding the Gongchang Prefecture Academy'

Danyang Gong

School of Literature, Lanzhou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

**Abstract:** During the Tongzhi years of the Late Qing, northwest China was plagued by war, coupled with continuous natural disasters, causing academies to nearly vanish. In the fifth year of the Guangxu reign, after witnessing the Gongchang Academy destroyed by warfare, Prefect Yan Shizhang of Gongchang led its reconstruction and composed the 'Stele of Rebuilding the Gongchang Prefecture Academy.' This article takes this stele as the core historical material and proposes the post-war dilemma of Confucian education in Longxi, namely, the desolation of schools, the decline of Confucianism, and the lack of moral guidance for the people. In response, Yan Shizhang, as a Confucian scholar, actively sought instructions from higher authorities, cooperated with local gentry, raised funds, and incorporated Confucian rites and systems into the reconstruction of Gongchang Academy in hopes of educating the people. The stele vividly presents the worries and practices of a Confucian scholar-official facing the ruins of the academy after war and provides a paradigm for understanding the dilemmas of Confucian education and official practices in Longxi during the Late Qing.

**Keywords:** Stele of Rebuilding the Gongchang Prefecture Academy; Dilemma of Confucian Education; Yan Shizhang; Practice

## 引言

同治五年回民起义，西北战火延及巩昌府（今甘肃陇西），巩昌府学宫尽毁于兵燹。地方秩序崩解，学校荒废，对于一位秉持圣道、负有教民之责的颜士璋而言，此种景象构成了强烈的精神冲击。光绪五年（1879）颜士璋，以知府身份主持了学宫的重建，并撰写《重建巩昌府学宫碑》。文中详细叙述了颜士璋从到任所见荒凉、向上请命、集资募捐、采木督工，直至竣工后“轮奂一新”的完整过程。碑记既是工程实录，更是儒家士大夫面对当时陇西儒家教育的困境而做出的实践。

## 1 巩昌府学宫及《重建巩昌府学宫碑》概况

巩昌府学宫又称“府儒学”。《甘肃通志》记载：“巩昌府儒学，学宫在府治东南，元中统初建，明两经改徙，皇清康熙二年始定今基。学署教授在学东北，训导在学东南。学生一年一贡，廩四十缺，增四十缺。入学每岁考取文武生各二十名，科考取文生二十名。学田每年于陇西县学田内支給。”<sup>[1]</sup>可见巩昌府学宫在明清属于府级官学，设有教授（学官名）和训导（学官名）等教职。其教育经费来源于学田，每年于陇西县学田内支給，直至清康熙二年（1663年），学宫地址才最终确定下来。同治五年（1866年），学宫不幸毁

于战火。光绪五年（1879年）得以重建，其遗址位于今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巩昌镇南大街西侧166号（现巩昌中学院内）。

同治五年回民起义，战火延及巩昌府（今甘肃陇西），府学宫尽毁于兵燹。战后地方凋敝，迟迟未能修复。颜士璋到任后，将重建学宫视为“正人心、息邪说”的首要政务，光绪五年（1879），颜士璋以知府身份主持了学宫的重建，并撰写《重建巩昌府学宫碑》以纪其事。此碑原在陇西南大街府文庙内，共510字，现已失落不存。碑文记载了巩昌知府颜士璋倡率府属官员及绅士捐资重修府学宫的背景、经过及意义。这次对巩昌府庙学的重建是历史上的最后一次，其规模布局沿至清末废科举兴学堂时代。

## 2 《重建巩昌府学宫碑》所见晚清陇西儒家教育困境

### 2.1 学校荒废

晚清甘肃属于多民族聚居地区，地方学校为府学、州学、县学，统名为儒学，使清朝的地方学制在甘肃得以全面实施。除此之外，还有书院、义学等，也是当时行之有效的教育形式。

雍正十一年（1733年），“壬辰（初十日），（雍正）令于各省会设立书院，择一省文行兼优之士读书其中，使之朝夕讲诵，整躬励行，有所成就。并赐各书院银一千两，以为士子膏火之资。”<sup>[2]</sup>即雍正命各省省城设立书院，并给予1000两白银膏火费。据史料记载，到光绪改革以前，甘肃所辖8府、5州、58县（包括今宁夏、青海部分地区）共有书院77所，遍及全省各地。

甘肃属于多民族聚居地区，甘肃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设立义学，同治年间，左宗棠任陕甘总督时，对文武官吏和士民子弟的求学问题十分关注，极力在少数民族地区兴建义学，推行教化。左宗棠《请分甘肃乡闾并分设学政折》中提到：“师行所至，饬设立汉、回义塾，分司训课，冀耳濡目染，渐移陋习，仍复华风。迩来汉民敦崇儒术，诵习六经，回民亦颇知向慕，争请设立义塾，延师课读儒书。”<sup>[3]</sup>为了让更多的回民子弟入学，他采取了一系列奖学办法，如对回民义学的学生免收学费，其书籍、笔墨、饮食等费用由官府补助。在左宗棠的倡导下，兴学之风甚为浓厚。

《甘肃通志》记载，巩昌府当时存在府学（即学宫）、书院和义学等，治年间动乱，甘肃大部分府学因战乱长期废弛，书院和义学也多被荒废，大多乱后拨用的民房又被武营的人占作官舍，生员和童生没有地方读书，考试日期形同虚设。

### 2.2 儒学衰微

巩昌府治在今甘肃陇西，地处西北边郡，属于多民族聚居地区，汉回等杂居，地方政府教化本就不易，而连年战乱，加之冰雹等自然灾害，造成甘肃大量人口流散，田地荒芜，老百姓生活艰难。颜士璋上任后，“朔望拜谒学宫”——每

月初一、十五依例前往学宫行礼，这一行为本是清代地方官的常规礼仪，但当他亲眼所见学宫时，只“见殿庑祠宇只余残壁数堵，缘同治丙寅遭逆变尽归兵火，满目荒凉”<sup>[4]</sup>。

颜士璋，字筱泉，家传“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之“四勿”祖训。颜士璋是山东曲阜人，自幼接受儒家教育，其身份本身就带有儒家的正统象征。这种身份使其对学宫的兴废格外敏感，也使其在乱后重建中具有天然的道德感召力。

颜士璋开篇即强调“伏惟圣道昭垂，揭日星而寿山河，木铎之教，百世上下莫不率由”。在他看来，孔子的圣道应如同日月山河般永恒，孔子的教化，千秋百代无人不遵从，郡城学宫是下属各州县的表率，道脉所系、文风所关，然而庙宇倾颓、典籍散佚、道脉中断、童子失学，对颜士璋构成了强烈的精神冲击，儒学之衰微可见一斑。

### 2.3 人心无所依归

儒家教化以“正人心”为首务。颜士璋认为，“凡有教民之责者，欲为之正人心、息邪说，鼓舞乎斯民，胥于学宫是赖。”，学宫是清政府教化的主要场所，没有学宫，就无法“正人心”，无法“息邪说”。当时正值回民起义后，他在碑记中虽未指明何种邪说，但结合历史背景，邪说很有可能指宗教信仰冲突、叛乱思想等等，学宫废墟意味着官方儒家失去了对地方的教化，人心无所依归，易被异端吸引，若不及时重建教化体系，后果不堪设想。

左宗棠《请分甘肃乡闾并分设学政折》中提到：“臣自西征以来，目睹民俗凌夷，泯棼日甚，不但劫杀争夺视为故常，动辄啸聚多人，恣为不法，而民间伦纪不明，礼教久斲，干名犯义之案，诛不胜诛。缘地杂华夷，习俗渐染日深，恐夏变为夷，靡所止极！不得已设局鄂省，影刊四书、五经、小学善本，分布各府厅州县。”<sup>[5]</sup>可见，确有民间风俗败坏、违法作乱、人伦纲纪不明，礼教废弃，违犯名分道义的情形，教育迫在眉睫。

## 3 《重建巩昌府学宫碑》所见颜士璋的儒家教育实践

儒学衰微，童子失学，面对重重困难，儒士们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将忧虑化为一系列的行动，颜士璋以重建学宫为切口，积极寻求各方支援，筹集经费，重修学宫，以期恢复道脉，重振教化。

### 3.1 官绅合作筹集重建经费

颜士璋身为知府，重建学宫的第一步就是获得上级的批准，碑记中写道：“爰请于揆帅左侯及崇方伯允准重建。”“揆帅左侯”即陕甘总督左宗棠，平定回乱，收复新疆，善后中极为重视文教恢复，几次上奏修复书院；“崇方伯”即甘肃布政使崇保，主管甘肃省财政与民政，掌握藩库银两。

颜士璋以知府身份越级请示督抚，既说明他对重建一事的高度重视，也表示此事需要国家财政的支持。得到批准重建后，颜士璋“躬率厅州县儒学捐廉倡之”。所谓“捐廉”，即官员捐献自己“养廉银”之外的俸禄。颜士璋带头捐献，然后率领府属各厅、州、县的学官（教谕、训导等）跟进，以此作为倡导。

除此之外，“又集资于府属之各绅士”，即在官员捐廉之外，颜士璋还向巩昌府属的士绅们募集资金。绅士是地方社会的精英阶层，既拥有财富，也在乡村具有道德权威。向绅士集资，一方面可以缓解资金压力，另一方面也是将士绅纳入儒家教化体系的过程：出资即意味着认同重建事业，未来学宫建成后，这些绅士自然成为教化的合作者与受益者。

由此可见，颜士璋不仅以身作则，同时向上请示争取重建学宫的合法性，向下调动官员与士绅的经济资源，体现了儒家“上行下效”的理念，也表现了儒家教育在晚清甘肃有着极为深厚的土壤和社会认可度，虽经战火，但道脉仍在，士心未冷，民望犹存。而这一重建实践也非个案，而是嵌入晚清西北文教复兴的整体脉络：左宗棠在兰州设立贡院、重修兰山书院，崇保于各府州广设义学，皆与巩昌府学宫重建形成呼应。至光绪元年（1875），甘肃乡试参考生员较咸丰末年增长近四成，由此，巩昌府的书院得以恢复生机，儒家的教育再次兴起，属县后学也闻风来陇求学，当时陇西文风大振。光绪十六年（1890年）有岷州人尹世彩与伏羌人王海涵中举，光绪二十年（1894年）有会宁人刘庆笃和伏羌人张斗南中举，他们为地方增添了科举荣耀。

### 3.2 巩昌府学宫重建

碑记详细罗列了重建的工程内容：“大殿两庑并名宦、乡贤各祠，若门、若坊、若池、若桥，罔不毕举。”<sup>[4]</sup>巩昌府学宫的建筑格局具有鲜明的官式特点，是“庙学合一”的典型体现，大成殿是祭祀孔子的核心建筑，两庑配祀先贤先儒，名宦祠祭祀历代在本地有德政的官员，乡贤祠祭祀本地出身而德行卓著者。门、坊、池、桥则构成学宫的礼制序列：棂星门、泮池、泮桥是科举入仕的象征。古代传说棂星为天上文星，以此命名意味着孔子为天上星宿下凡。天子太学称“辟雍”四周环水，诸侯之学称“泮宫”，泮池又称“学海”，寓意求学如渡海，需苦读成才，同时也寄托了“思乐泮水，薄采其芹”的入学典故。泮池也营造了尊孔和兴办教育的文化氛围，是地方文化中心的标志。凡生员入学、祭祀孔子，必经泮桥，寓意“入泮”求学。

此外，颜士璋还在传统格局之外有所增建：“大殿之后为崇圣祠，庙之东偏添建明伦堂。”崇圣祠用以祭祀孔子五代先祖，体现了“追远尊祖”的儒家伦理；明伦堂则是学宫日常讲学的场所，取“明人伦”之义。这两项增建并非多余，

而是颜士璋对“教化”功能的强化——崇圣祠连接祖先崇拜与道统传承，明伦堂则为生员提供了固定的学习空间。

学宫中的泮池、泮桥、棂星门、大成殿、明伦堂、崇圣祠等，构成了一套完整的儒家礼制建筑。每一个进入学宫的人，从跨过泮桥的那一刻起，就开始了求学的过程：桥象征从“野”入“文”，殿象征对圣人的敬畏，堂象征对伦理的学习。儒家教育不需要言语，只需让人看到这些建筑，就能产生潜移默化的效果。这种规训比强制法令更柔和，也比空洞说教更有效，因为它通过日常感知塑造了人们的认知框架。正如碑记所言“涵濡教化”，如同水滋润万物，无声无息却无处不在。

重建后，颜士璋称其“涂饰丹艘，轮奂一新，展谒之下，不但举向之蓬蒿瓦砾翻然改观，即较之昔日规模有其过之无不及也。”<sup>[4]</sup>，即不仅用红色油漆和彩绘装饰，同时已然超越了旧学宫，“美矣备矣，乐育大材，道在是矣”，此后，学宫必然成为陇右学子研习经义的神圣场域，道脉非但没有中断，反而得到了发扬。

### 3.3 颜士璋的儒家教育期望

碑记中提到，颜士璋认为“庶几一郡之秀者、顽者、贤者、愚者，耳而目之，勉而励之，予以振起人文，涵濡教化，争自濯磨于太平之世。则此一举也，揆之化民成俗之道，不无小补也夫。”孔子“有教无类”，他认为，教育应是面向民众，不管是聪慧的，愚钝的，还是有才能的人，都应该“耳而目之”，看到学宫的庄严气象，听到学宫的钟鼓声，从而在潜移默化中生发向学之心，激发内在的学习动力，最后达到“振起人文，涵濡教化，争自濯磨于太平之世”的目的，振兴文风，浸润教化，在太平盛世中争相砥砺修身。对于教化民众、培养良好风俗来说，有所裨益。颜士璋将学宫重建与“太平之世”关联，认为只有儒家教化恢复，真正的太平才能实现。这既是对左宗棠“同治中兴”的政治呼应，也是儒家“德治”理想的一贯表达。

对此，颜士璋也作《陇西巩昌府文庙》：“规模从阙里而来，遥瞻东鲁；经理得圣人之后，丕焕西隆。”<sup>[5]</sup>此联以“阙里”代指孔子故里曲阜，以“东鲁”喻儒家道统之源；“圣人之后”既指承继孔孟之道的儒者，亦暗含对左宗棠等名臣的尊崇。“西隆”则点明学宫地点。颜士璋表明陇西巩昌府学宫规格格局从孔子故里传承而来，远远地瞻望着东鲁；经营治理得到圣人后代的协助，使得此地得以光大焕发。

## 4 结语

《重建巩昌府学宫碑》详细记载了光绪五年，颜士璋到任所见荒凉、向上请命、集资募捐、采木督工，直至竣工后“轮奂一新”的完整过程。碑记既是工程实录，更是儒家士大夫面对当时陇西儒家教育的困境而做出的实践。

同治动乱,加之受鸦片战争和自然灾害的影响,清政府朝政废弛、内忧外患,文教衰微,在陕甘总督左宗棠的兴学举措推动下,甘肃官学、书院得以重振,巩昌府学宫重建正是这一复兴浪潮中的关键一环。颜士璋躬身力行,非止于修屋宇、立规制,更以教化为本心,使学宫成为凝聚士心、涵养民德、接续道统的载体。其碑记字字沉实,句句含情,既见儒者担当,亦映时代回响。当地人立《善后颜聘卿郡伯德教碑》,碑文盛赞其“继自今人文蔚起,科第蝉联,皆夫子教育有以肇其基也。十属均沾德教,陇邑之被泽更渥。”<sup>[6]</sup>,以此感念其恩德。

#### [参考文献]

- [1]凤凰出版社编.中国地方志集成省志辑·甘肃1乾隆甘肃通志1[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08:249.
- [2]章开沅主编.清通鉴雍正朝乾隆朝2[M].长沙:岳麓书社,2000.05:184.
- [3](清)左宗棠撰;刘泱泱等校点.左宗棠全集奏稿五[M].

长沙:岳麓书社,2014.08:513.

[4]汪楷主编.陇西金石录下[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0.12:174.

[5]陈田贵主编.甘肃对联集成[M].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2015.01:296.

[6]汪楷主编.陇西金石录下[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0.12:178.

#### 作者简介:

巩丹阳(1988-),女,汉族,甘肃正宁人,兰州文理学院文学院,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学。

#### 基金项目:

甘肃省高校教师创新基金项目《儒家思想在清代丝绸之路甘肃段的文化认同及其当代价值研究》(项目编号2024B-201)。